



**信赖与友爱**

XINLAI YU YOUAI

李廷江 编

生活·青春·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5印张 75,000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定价 2.45元

ISBN7-108-00233-7/K·26

文 際 國 州 九 回  
YUSHU INTERNATIONAL CULT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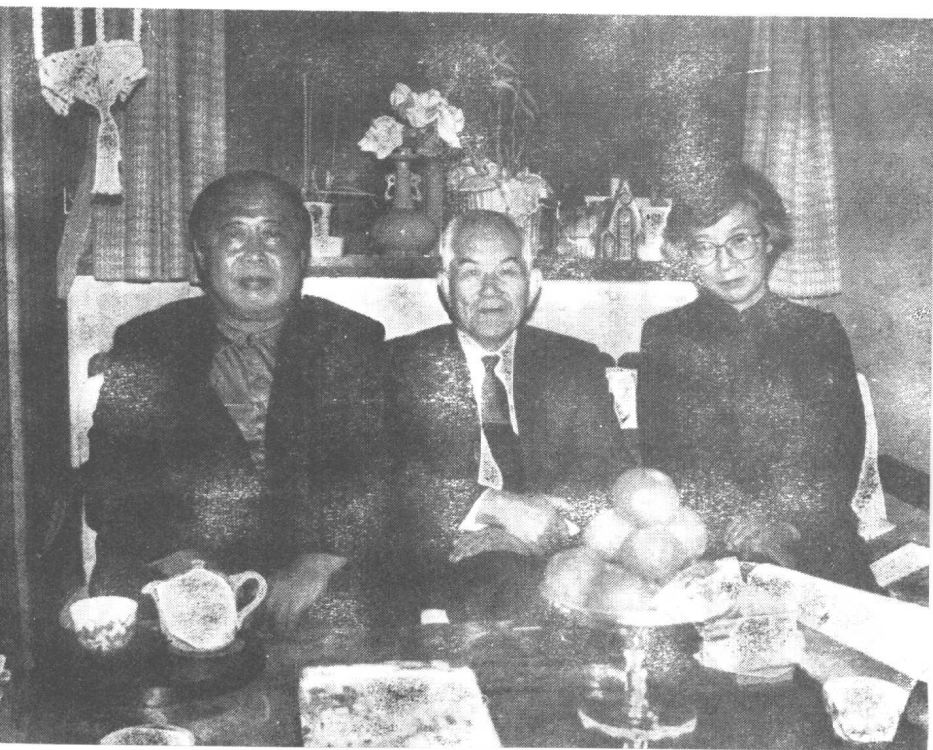




隅谷先生(中)1970年在第四届九洲国际文化会议上。

隅谷先生在第四届九洲  
国际文化会议上讲话。

1985年隅谷先生(中)  
与中国劳动人事部王  
振基在一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隅谷在1986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少有良知的日本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抱着歉疚之情，从而使中国人民的交往具有了新的眼界和高度。本书通过介绍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隅谷三喜男先生为解决中国留学生生活困难而热情奔走的感人事迹，反映了日本人民对中国的真诚感情。书中有对隅谷先生业绩的介绍，有隅谷先生自己写的两篇文章，更有大量日本民众为中国留学生捐款写给隅谷先生的热情真挚而朴实的信，读来感人至深。

106

# 目 次

中日关系与东方学术交流协会 . . . 隅谷三喜男	1
学问与信仰 . . . . . 李廷江	6
——记日本经济学家隅谷三喜男先生	
从留学生问题思考国际化 . . . 隅谷三喜男	26
——如何利用战前的教训	
捐款者来信 . . . . . 隅谷三喜男	41
东方学术交流协会捐款者名册 . . . . .	135



隅谷三喜男

## 中日关系与东方 学术交流协会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自隋代始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日本文化是通过引进和消化中国文化形成的。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日本人一直对中国怀有敬意，并试图学习中国。

然而，从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实行开国并加入帝国主义行列时起，情况便急转直下。十九世纪末以后，日本成为帝国主义的势力之一，与中国的关系也处于不幸的状态。但是，截至二十世纪初，由于多年的影响，仍有不少日本人试图以某种形式援助中国的近代化，一些在日本的民主化运动中受挫的青年唱着“中国有四亿人民”的歌子，支援由孙文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国也有许多青年学生怀着学习的愿望，来到在近代化方面已取得初步成功的日本留学。据说，其数字曾一度超过1万。

但是，这一切均以不幸而告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

时起，日本实行更加帝国主义化的对华政策，中国留学生们反对日本的对华态度，他们是带着反感离日回国的。从这时起，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中国的敬意迅速丧失。更不幸的是，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在此后的15年间，中日一直处于交战状态，日本不断地对中国各地进行军事侵略。中国民众在以日本为主的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

我于1941年毕业于大学。当时找工作的志向是能够成为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朋友。我以为，处于日本半殖民地统治状态之下的中国东北的工人就是事实上的受压迫的人们，于是，便在现已成为鞍山钢铁公司的当时的日属制铁所找了一份与劳工有关的工作。在那里，我一直致力于改善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故而赢得了许多中国朋友。但是，当战争结束后冷静地进行思考时，我深深地认识到：“作为个人，即使是尽良心工作，但从大局来看，却是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尖兵而工作的。”我决心回到日本后重新学习社会科学，研究亚洲的社会和经济开发问题。

我在1946年9月回到日本，当年11月成为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助教(1948年4月升任副教授)，开始了以劳动问题为中心的经济学研究，但亚洲的经济开发问题是我始终关心的问题之一。1960年以后，我研究了菲律宾

的经济开发问题，70年代初编纂了题为《亚洲的开发与劳动问题》一书。此后，应南朝鲜朋友的请求，着手进行南朝鲜经济的分析。其间，曾几次赴南朝鲜访问，考察那里的工厂、与南朝鲜的社会科学界人士进行座谈，并于1976年出版了《韩国经济》。朝鲜半岛作为日本的殖民地，经历了35年的艰难历程，我对数以百万计的朝鲜人出于个人意志或被迫居留日本一事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也有不少朝鲜朋友，因此，对南朝鲜问题涉之甚深。

可是，就在1976年的12月，我多年的访华宿愿终于得到了实现。我作为东京大学访华团的成员之一，访问了“文革”后的中国，与北京大学的老师们进行了恳谈，而后经西安、上海回国。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中国与 I 我生活了5年的战时的中国相比，发生了沧桑巨变，中国人民丰衣足食的景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新中国感到亲切，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深切的关心。

不过，我与中国的亲密关系，是在第一次访华的数年之后我担任东京女子大学校长，进而担任日本劳动协会会长之后建立起来的。在此前的1978年，中日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中日交流趋于活跃，但仍有许多社会科学界人士希望访日。战争期间，东京女子大学接受了许多中国留学生。“文革”后，她们在各地的大学担任日语或日本文学的教师，但时经30多年，日语也发生

了变化，因此，她们之中有不少人希望到日本学习日语。于是，我们便邀请她们到大学学习，短期的为1至2个月；长期的为半年或1年。我与中国的亲密关系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设立了外国人奖学金，为每年送1至2人到研究生院学习提供了机会。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进展，发生了原来未曾想到的劳动力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没有经历过的，中国对日本处理工资问题、养老金问题、待业(失业)问题及至雇佣合同问题的经验产生了巨大的关心。在日本，与中国所关心的这些问题相对应的单位，主要是日本劳动协会，因此，我与中国劳动人事部、总工会的关系很密切，由于这些关系，在80年代，曾几次应邀访问中国，从而有机会与中国当局人士进行亲切的会谈。

在此期间，从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逐渐增加。但是，领取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为数很少，日本政府或民间的奖学金范围也很有限。因此，大多数留学生是自费留学生，由于家里不可能寄款到日本，留学生们的生计只能依靠某种形式的勤工俭学来解决，日本的生活费和学费很高，留学生们的学习生活有不少困难。这种情况，是生活在“富足社会”的日本人不能漠然视之的。我们向一些人呼吁：“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但应当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我们的愿望是，多募捐一些钱，

建立一个与之相应的组织——“东方学术交流协会”，而且决定第一年以几十个在研究生院学习的留学生为中心颁发奖学金。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计划，我们在日本最有影响的报纸《朝日新闻》的“论坛”栏里刊登了有关中国留学生的现状与东方学术交流协会的事业的介绍文章。孰不知，这样一来，引起了超乎我们预想的反响。许多日本人由衷地赞成这一奖学金制度，他们抽出生活费寄给我们，其金额超过了1500万日元，1988年度，我们又向十几名留学生颁发了奖学金。

这一制度的建立，是日本人对中国的感谢和怀有好意的表示，她的作用不仅仅是为留学生们解难排忧，而且可望作为中日友好的一个纽带发展下去。我由衷地希望源远流长的中日关系能在信赖和友爱之中结出更多的硕果。

李廷江

## 学问与信仰

——记日本经济学家隅谷三喜男先生

几年前，为筹建中国留学生奖学金财团，我拜访了隅谷三喜男先生。当时，这位德高望众的日本劳动经济学的创始人，除了担任东京女子大学校长外，还在政府、民间等部门兼任了30多个职务，被称为“超忙人”。因是老朋友，见了面，我强调了中国留学生如何困难，设立财团如何重要。隅谷先生听后，提了几个问题，便欣然地接受了下来。

至今，奖学金财团已经为30几名中国留学生提供了经济援助。几年来，我有幸经常接触先生，这位和蔼可亲、富有幽默感的长者深深地吸引了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后来，我才听说，隅谷先生于3年前患了癌症，筹建奖学金财团当儿，正是手术后连续几次入院的时候。也可能是身在他乡异国的缘故，长时间里，我受到了一

种极大的感动。我开始观察隅谷先生、注意收集资料，并同先生进行了几次长谈。

……

先生是何等崇高。又是何等的纯洁。我实在无法叙述先生的整个生涯。

我一直想诉说，但也只能把我所了解、所熟悉的隅谷先生告诉给大家。

## 人间的条件

据说作家五味川纯平以隅谷先生为模特，于50年代初，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人间的条件》。小说一问世，立刻轰动日本，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响。小说的主题是揭露战争的罪恶、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歌颂人间的平等。

隅谷先生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双亲是虔诚的教徒。1908年，父亲巳三郎为了给无钱上学的孩子们办夜校，住进了港区贫民窟谷町。少年时代的隅谷，受家庭的熏陶，思想十分自由。进入大学后，开始反抗和抵制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体制。3年级时，在东大经济学部里进步教授们的影响下，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同几名同学一起组织了《资本论》研究会。不久，东大经济学部的大内力、有泽广已等进步教授被逮捕。卧病在床

的隅谷也被警察当局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莫须有“罪名”而投入狱中。

出狱后，隅谷先生决心以自己的知识，解除殖民地统治下工人的苦难。他不顾体弱多病，毅然选择了到中国东北鞍山的钢铁厂工作。体检时，医生说，“这样的身体去鞍钢，纯粹是找死”。在当时的鞍钢，他目睹了殖民地统治下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不到1年的时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山田盛教授的理论，写下了《东北劳动问题序说》（上）（下），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的劳务管理制度，引起了军部、劳务当局的注意和非难。

《人间的条件》正是以当时的隅谷为主人公，描写了战争期间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反抗。

日本投降后，隅谷先生又返回了东大经济学部。这是因为，在整个战争的失败过程中，他痛感知识的贫乏和知识分子的软弱。回顾在鞍山工作时，他以论文为武器批判了日本的殖民地政策和劳务管理，虽然部分地改善了工人的处境，但在客观上仍然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殖民地统治的帮闲。反省这一段历史，隅谷先生感慨无限，谈话中交织着悔恨和激动。

“战争期间，由于我对战争有抵制有批判，被视为非日本国民。可是，认真想一想，从大的方面来看，我到



底是站在侵略者的一边，帮了帝国主义的忙。经济学、尤其是劳动经济学，究其终就是要以社会、人群为对象，唯有立足于大众，这样的学问才有价值，对社会发展才有意义。”

### 首先是学者

作为学者，隅谷先生有着辉煌的业绩。截至1980年止，先生的著作共计学术专著50部、学术论文近250篇。他创建了日本劳动经济学，开辟了研究韩国经济的先河，是日本基督教研究领域的权威。先生是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是日本学士院的年轻会员。在执教于东大的30年里，先生致力于学术的研究，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令同行欣羡不已。其创新精神冲击和动摇了传统的学问体制，正象24岁毕业时，为了接触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他选择了去鞍钢工作一样，关心历史发展中民众的存在与作用，始终贯穿在先生的著述里，联系着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隅谷先生重视经济学中人的问题，源于少年时代生活在贫民窟中的所闻所见，源于鞍钢5年同中国工人们的接触和感受。他首先选择了经济学中的劳动问题。

1949年，刚刚当上副教授的隅谷先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社会政策主体与客体中的工人问题，力图从社会